

历代  
辞赋  
研究史料  
概述

马积高 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

马积高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马积高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傅璇琮主编)

ISBN 7-101-02383-5

I. 历… II. 马… III. ①词(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②赋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049 号

责任编辑:王海燕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

马积高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¼印张·235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

ISBN 7-101-02383-5/I·335



#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

## 总 序

傅璇琮

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于几年前即提出编辑《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起步并不太快。经过几年的准备,穆克宏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将在今年出版。如何使这套史料研究丛书能加快进行,以适应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需要,古典文学编辑室徐俊、顾青两位主任曾几次与我讨论,现经商议,确定由我担任丛书的主编,负责整体构思与组稿。作为中华书局总编,我也有责任把这一不算太小的文化工程承担起来,希望在以后几年内这套丛书能粗具规模。现在已经组约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积高先生的《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湘潭师院中文系陶敏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还有带有学术史性质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湛侯先生的《诗经学史》,其他尚在陆续联系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取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中华书局的这套书,定将会有不小的规模,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里面就有一个对工程整体结构进行了解、分析和设计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我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倪其心教授及已故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沈玉成研究员就此进行磋商,后即以《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为题,撰文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上刊载,表述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全面切实探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取得整体了解和认识,是进行宏观控制、微观审视的依据。有了整体结构观念便可更真切了解近几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在基础工程和上层结构各方面,有哪些成果和成就,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哪些方面应当突破和开拓,哪些门类可开辟新分支,等等,从而可以更科学地择定重点项目和课题。

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如:(一)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二)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

上层结构范围较广,很难全面罗列,就现在想到的,大致有:(一)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流派

的专题研究,以及文学通史、专史的撰著。(二)作品的批评鉴赏,包括古典文学各种方式的普及工作。(三)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服饰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四)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古今文学比较、同一主题创作的历史比较。(五)新分支学科的开辟,如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又如搜集古典作家作品的图录、碑刻、手迹等文物,分析它们在作家创作、作品传播、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它们自身的特点,开辟一门古典文学的文物研究。(六)方法论的研究,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一般的及具体方法的研究。(七)学科史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及古今杰出学者的研究。

从以上并不完全的叙述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内容是十分宏富的。基础实施与上层结构的结合,必更能发扬古典文学的精华,深入探索艺术规律,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当代创作,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自身的贡献。

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实施,但应当说它是涵盖以上两方面的内容的。它的触及面可能还要广,举凡与作家作品有关的史书(如正史、别史、杂史等)、地理、各种体裁的笔记、社会民情的记载等等,都应有所述及。而且它还与其他一些学科有所交叉,特别是

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料检索学等,关系更为密切。古人说,六经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代包括经史子集中的典籍,都与文学史料有关。而且文学史料还应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我们的史料学研究不能只看古人,更应注视现实,及时反映新的成就。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增加研究和撰述的难度,但同时对于应用者来说,则是由此获得仅靠一己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的众多、有效的资料。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二十一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

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作已是一个热点不断产生。这些著作当各有其特点。我们想,我们这套史料丛书,将是各种体裁、各种观点的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不管写怎样的文学史,不管研究哪一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包括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将参考这套史料书。我们抱着为研究者、教学者服务的态度,希望在学术工作中做一点真正有用的实际的工作。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已经走在文学的前头。早在1962年,冯友兰先生就出版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本书虽不到二十万字,却是建国以来文史哲类史料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概述了商周至民国初期的各类哲学史籍,语言明晰,条理清楚,而又评价得中,表现了一位哲学大师高深的学术

造诣。嗣后有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刘建国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历史学方面,有陈高华、陈志超诸位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这是通史性质的。其他还有断代的史料学,如黄永年、贾宪保先生的《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冯尔康先生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张宪文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另外如谢国祯先生的《史料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翦伯赞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荣孟源先生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则是通论性的。比较起来,古典文学这方面的成果则较少。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两种,一是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一是徐有富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这两本都是通论性质的,前者分“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按文体分)、“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后者分“文学史料类型”、“文学史料鉴定”、“文学史料整理”、“文学史料检索”。这样通论性的著述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想,为了使读者具体掌握文学史料,还是按时代、按作家作品系统地论述,较切实用,因此我们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时代分(但不拘泥于某一朝代),一种是以文体分。既概括地叙述各种史料,以史料介绍为主,也可以从学术史角度,论述历代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绩(如洪湛侯先生的



《诗经学史》),把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这将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治学路数必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一九九六年六月

# 目 录

上篇 历代辞赋及研究概述·····	(1)
一、什么是辞赋和辞赋研究的范围·····	(1)
二、先秦两汉辞赋的兴盛、存佚与研究·····	(27)
三、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发展、存佚与研究·····	(68)
四、唐五代辞赋的新变、存佚与研究·····	(95)
五、宋金元辞赋与研究概况·····	(116)
六、明清辞赋与研究概况·····	(140)
七、现代辞赋研究·····	(163)
下篇 辞赋要籍叙录·····	(183)
一、辞赋总集·····	(183)
二、收录辞赋的著名文学总集·····	(218)
三、古今赋话(附赋论选)·····	(241)
四、现代中外赋学论著·····	(252)
附录:赋学书目举要·····	(295)
后记·····	(310)
校稿后记·····	(312)

# 上篇 历代辞赋及研究概述

## 一、什么是辞赋和辞赋研究的范围

辞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之一体,研究辞赋,自然必须研究它同其他文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但主要是研究辞赋创作和理论,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似乎不需要什么说明。实则不然。这是因为,辞赋虽可视为一体,也不能不视为一体,但其内部却有不同分体。这些分体虽有某种共同之处,在发展过程中也互相交叉、互相浸透,但其源既不同,流亦有异,具体地说,它们有的是诗之变,有的是文之变或文的诗化。因此,它们同有关诗体和有关文体都有割不断的纠葛。就是说,有些作品我们既可称之为辞或赋,也可称之为诗;也有些作品既可称之为赋,又可说它们是别的体裁中的韵文。正唯如此,我们在研究辞赋的时候,就有必要对其总体和各个分体的体裁特点进行探讨,从而确定研究的范围。

据我的考察,要对辞赋给一个绝对确切的定义和划定一个非常清楚的范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但与某些其他文体的纠葛是不能截然分割的,自身的特点也在变化中,难以作出至当不移的概括。但它既然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体裁流传,总有某种较为凝固的特点,因而要大体上划一些界限又非全不可能。不过,这需要从源探流,又从流溯源进行综合的考察。在此,我仅从确定那些应作为研究辞赋的资料的需要出发作概略的论述,与此无关的问题,则尽量避免或不加申论。

### (1) 辞赋作为体裁名称的由来

辞的本义是“讼”(据《说文》),争讼必有言语与文辞,故辞又有言辞、文辞之义。《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怛矣,民之莫矣。”郑笺云:“谓政教也。”乃是据上文为说,实指关于政教的文字、言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晋叔向曰:“辞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则专指外交辞令。余如《论语》载孔子之言“辞达而已矣”,《易·文言》说“修辞立其诚”,则兼指言辞与文辞。此盖先秦之通义。至于屈、宋之作的称为“楚辞”,则未详所始。然《汉书·朱买臣传》说:“召见,说《春秋》,言楚词。”(按词、辞古通)《王褒传》亦有“楚辞”之名,又今传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乃本刘向所集《楚辞》而作,则西汉已有此称。为什么屈、宋之作会称为辞?汉人没有说明。然据《汉书·王褒传》云:“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严辑《全汉文》所载刘歆《七略》残文略同),而《毛诗·定之方中》传有“不歌而诵谓之赋”语,《国语·晋语》“舆人诵之”,韦昭注亦曰“不歌曰诵”。又诵、讼同音,亦可通假(《史记·吕后纪》“未敢讼言诛之”,《索隐》:“讼,诵说也。”),可知屈、宋之作称为“辞”,盖取其“不歌而诵”之意,以与和乐的歌诗相别。

赋,《说文》:“敛也。”知贡赋之赋乃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故赋又有铺陈之义。引申之,遂称作诗言志或诵诗述志为赋。《左传》屡载其事,人所习知。赋诗皆不和乐,故《毛诗传》有“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说,而《国语》有“师箴、誓诵”之文,诵即赋诗。至于何时以赋诵之赋作为“不歌而诵”的文体之名,亦未能详。现存《荀子》中有《赋篇》,内收《礼》《智》《云》《蚕》《箴》等作品,《韩非子·外储说左》亦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一语,则战国晚期赋已成为文体之名是无疑的。今传宋玉《风》《高唐·神女》《好色》等亦标明为赋,但后人或疑非宋玉所作,又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引宋玉《高唐神女赋》作《高唐对》,则

其初是否已标赋名亦难定，故姑不引为例。然由赋诵之赋转变而为不歌而诵之体，其间只有一间，颇疑荀、韩之前早有此称，但春秋以前未见此名，其始当在战国之间。

辞、赋既均为“不歌而诵”之体，故汉人辞、赋每连称或混称。《史记·司马相如传》：“会景帝不好辞赋。”班固《离骚序》：“（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汉书·王褒传》：“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贾邹枚路传》：“梁客皆善属辞赋。”均为辞赋连称之例。《史记·屈原列传》谓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谓宋玉、唐勒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已是辞赋混称；《汉书·扬雄传》说：“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不惟称屈原之作为赋，且称司马相如之作为辞，尤为辞赋混称的最典型的例证。

辞、赋在汉虽被称为完全同体，后世则有人加以区别。大致说来，韵文而称为辞者，限于骚体或近于骚体，赋则成为其它各种赋体的统称。此种区分，盖由误解刘向、王逸所辑《楚辞》多为骚体而来，又因萧统《文选》在赋外别立辞一类而著。然《楚辞》所收，既不尽为骚体；《文选》赋类所收，属于骚体者尤不少；互相渗透，体式不纯者尤多。厘而为二，殊多纠葛，故多数作者和研究者仍多以辞赋连称或以赋统辞。但不论是从流溯源或是从源探流，赋都是兼有众体的，且大体有各自的演变之迹，或言其合，或究其分，我认为都是可以。

## (2) 赋的起源

关于赋的起源，历来说法纷纭，今人之说亦不一，约言之，有四种：

①古诗之流说。其最简括的表述是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然细读班固此序及其所撰《汉书·艺文志》，他所谓“古诗之流”与后来左思、皇甫谧及刘勰等的阐述实有区别，故我在《赋史》中曾把它分为两说。考虑到两说亦有相因之处，故一并介

绍,而仍加区别。又据刘勰《文心·诠赋》,《汉志》所云实本于刘向(引文见后),非班氏一人之见,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代表汉人的看法,故先从《汉志》说起。《汉志·诗赋略》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按:此所引“《传》曰”,前人谓即指前已引述的《毛诗传》。但《汉志》本于刘向,刘向习鲁诗,未必引毛传或另有所本,此且不论,其所说的赋,尚可理解为动词。《诗赋略》加以发挥,就把作为动词之赋与作为文体之赋联系起来。其言“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贤人失志之赋作”,殊觉简略。盖诗之流为赋,原因匪一。近人朱光潜说:“诗所以必流于赋者,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渐由粗要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肃以至于放肆。”(《诗论》第十一章,见《朱光潜美学文集》)即是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时散文亦由简趋繁,由粗趋精,可为佐证。而散文的发展又显然影响着赋体的形成,《汉志》将这些都忽略了。但周室衰微,“礼坏乐崩”,采诗之官亦废,也不能说不是文人吸取民间新形式和散文新成就而创造出新文体的重要条件之一。故《汉志》之说,仍然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班固《两都赋序》之说,似与《汉志》有所不同,实则互相补充。《序》云: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宽……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谏,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

亦雅颂之流亚也。

这主要是从诗赋的社会作用来说明二者的继承关系，正是对《汉书》所云“微言相感”与“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补充。这两段话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诗、赋之体有变，其抒情言志的社会作用则同，但都没有把赋与诗的六义之一的“赋”联系起来。这应代表汉人，特别是东汉初年以前人的看法。盖六义之说出《毛诗序》，又见《周礼·大司乐》，称为“六诗”。《诗序》旧传为孔子弟子子夏作，或云子夏作，毛萇卒成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范曄《后汉书·儒林传》则谓为东汉人卫宏作。至今争论未决。此姑不论。即使刘向、班固时《毛诗》已有序，然西汉时《毛诗》《周礼》皆属于古文经，不为世所重；东汉初虽有名儒郑众、卫宏等传习，仍未显，且不列于学官；至东汉末郑玄笺《诗》，以《毛传》为主，始大行。《周礼》尤不为人所征信，至东汉后期马融、郑玄为之作注，始为人所注意。故刘、班论赋与《诗》的关系而不及《诗》之六义，是很自然的。

把赋体之赋与《诗》六义之一的赋牵合在一起，盖始于左思、皇甫谧，而刘勰承之。但他们三人又微有区别。左思在其《三都赋序》中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其间虽提到“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但删除“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语，而仅以六义之一作为班氏“古诗之流”的依据，这是与班氏的原意不符的。皇甫谧则牵合二说而浑言之。其《三都赋序》云：

古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细之王教，本乎劝戒也。……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

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词赋作焉。……

对照《汉志》之文，可知他所说仍以《汉志》为本，只是在发挥其义时扞入《诗序》六义之说。其意盖以“不歌而颂”（颂通诵）以下为赋之体裁特征，“诗人之作”以下则申述其渊源，于二者之关系，则不置辨。刘勰稍不同，其《文心·诠赋》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矇〕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芳之赋“狐裘”，结言短〔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以此与皇甫谧之说相较，可知刘勰把赋体源于六义之一的观点提得更为突出了，而把“不歌而诵”降为从属的地位。刘勰的精明之处是他意识到此说与“不歌而颂”之说的不同，从而用“总其归涂”二语加以弥缝，不像皇甫谧那样蒙混过去。其最后的结论尤较精。

②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说。此说出清人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诗教上》已略示此意。至《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更明确地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按：此说是对赋的渊源的研究的重大突破。其贡献是：不限于从韵文（《诗》《骚》）的角度去探讨赋体的形成，而注意到散文对赋体形成的影响。

③本于纵横家言说。此说与章学诚说相近。姚鼐编《古文辞



类纂》，将《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弑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亦收入“辞赋”类，盖亦有见于此。近人则章太炎、刘师培均主此说。章说见《文学说例》，云：“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转引自舒芜《近代文论选》）其言不甚明晰，但他以纵横家言为赋之先导的观点还是清楚的。（其《国故论衡·辨诗》中言之尤详，不俱引。）刘氏之说尤较详悉。其《论文杂记》云：“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见《汉书·食货志》），故诗赋之根源，唯行人研寻最审。……《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学皆源于古诗。……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考作者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诵谓之赋。’案‘登高能赋’之言，本于《毛传》（《鄘风·定之方中》），在‘君子九能’之内。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总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赋’与‘使能造命’相次，其为行人之诗赋无疑。……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盖溯源于纵横家哉？”

按：刘氏谓周时行人之官与诗的关系密切，信而有征；谓行人流于纵横，则似是而非，二者实为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物，只是纵横家有时亦兼充使命之职而已。但赋中假设对问之体，虽亦颇受儒、道等诸家著述的影响，而尤近于纵横家言，刘氏、章氏特别突出它在赋体形成中的作用，仍然是可注意的。又中国诗体的变化，多导源于民间，赋中之骚体，亦导源于民间的歌辞，由问答体演变而成的文体则不然，它应是文士从纵横家言和诸子著述得到启发的创造。章学诚及刘师培、章太炎在这方面所作的论证虽